

■新作聚焦

陶纯长篇小说《浪漫沧桑》：

革命湍流中的痴情人

□杪 桫

陶纯的《浪漫沧桑》也在探讨“革命时期的爱情”，但不同的是，作者顺着“启蒙”的路子，书写爱情在革命洗礼中对个体命运产生的重大影响，由此建构起了新型的革命与爱情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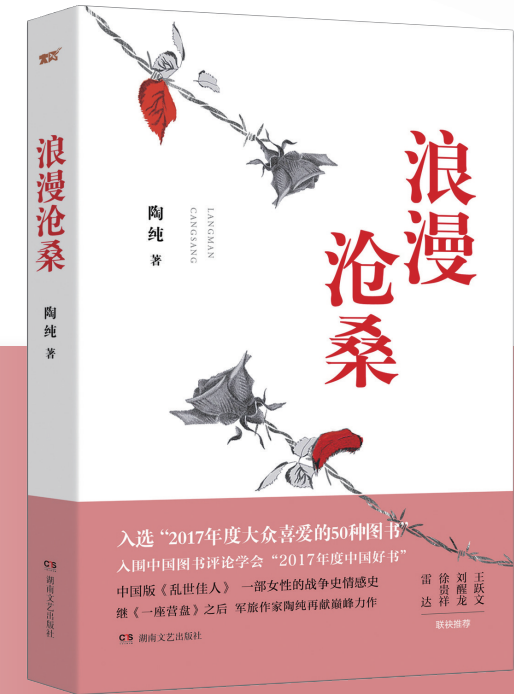
小说对历史做穿刺式剖析，通过女主角余开贞跌宕传奇的一生，既展示了新女性对爱情的追寻和坚守，又折射出了人面对历史时的无力感；同时，小说以对革命者、反革命者和投机主义者等的形象塑造和不同力量之间激烈斗争的场面描写，以及人物对不同道路的选择，反映了历史的复杂性，也以此鉴照人性。

余开贞是国统区龙城公安局长的女儿，“李兰贞”这个名字得自她进入我党游击区后的命名。她最初参加革命，不是因为有救国救民的理想，而是受了爱情的“蛊惑”，追随爱恋的地下党员汪默涵投身到革命阵营中。汪默涵尝试发展她为革命工作，但却引不起她的丝毫兴趣，由此他断定她“身上缺乏革命的基因”。而汪默涵此时已结婚成家，无论如何都不具备与余开贞谈恋爱的条件。但为了安全离开龙城，他不得已利用与余开贞谈恋爱做掩护。余开贞对汪默涵的感情是单纯的，但她的爱情之路刚刚开始就“误入歧途”，究其原因，一方面她涉世未深，在情感震慑下不能自拔；而最根本的是，混乱的现实使她无法实现爱的梦想。

在以往的写作中，女革命者常常怀揣救亡的理想走上革命的道路。《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便是如此。但在余开贞身上，优裕的家庭生活使她没有改变命运的想法，也没有抗婚的坚定性，她决定留下来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对汪默涵的爱，也有短暂的营地生活使她对人生体会到的新感受，同时也因为江山、江母、杨天龙等的关心使她感受到了集体的温暖。人物命运的转折没有被作者纳入到既定的成规中来，而是返回到人最朴素、最基本的情感层面上，刻画出了一个痴情的革命者形象，这在这类题材的写作中是有新意的。

《浪漫沧桑》与以往革命现实主义写作的不同之处也在于面对历史时的立场和态度。小说并没有演绎简单化和概念化了的历史结论。余开贞的革命经历和思想状态是一个明显的例证，除此之外，从革命的复杂形势中对历史做可能性的探究也是重要方式。

余开贞的父亲余乃谦是一个投机分子，他的所作所为既有作为反动政治人物卑劣的一面，又体现着人之常情，投机心态使其始终身处力量纠葛的历史现场中，成为各方矛盾的组结点和复杂社会现实的象征。革命阵营中的江山、罗金堂等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人物，尽管他们是坚定的革命者，但同样呈现出复杂的面目。这些人物尽管与我们过去的文学书写有差别，但却有历史的真实性：革命队伍里的纪律和革命者的思想观念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来自长期



的斗争实践。

陶纯善于呈现和处理小说中的复杂矛盾。他笔下的人物像在迷宫中行走，他并不给定其正确的路线，而让人物自身做尝试；他们深受各方力量的羁绊却不会中途“马失前蹄”，一直依靠自身的力量向前行走，并最终走进读者心中。在另一部小说《一座营盘》中，他以军人的勇气揭开了和平年代部队精神蜕变和军营腐败的真相，暴露出来的现实生活的复杂矛盾丝毫不亚于《浪漫沧桑》所描写的革命斗争。

《浪漫沧桑》试图呈现历史洪流对个体的影响。余开贞对爱情失望之后，一反理想主义娇小姐的性格，抱着接受现实的态度，无论嫁给罗金堂，还是作为收编龚黑柱的筹码，以及最后与杨天龙成家，她都无怨无悔。事实上，她的转变并不是从政治和思想高度上树立起了坚定的革命信念，而是朴素的个人情感所致。但是，革命斗争对于俞开贞来说，仍然是最主要的救赎力量。她抱着拯救的目的嫁给龚黑柱，当丈夫即将背信弃义投入敌人的营垒时，她毅然决定将其杀害。她对待“九路军”人员的态度和方法，则表明她已经潜移默化地受到了革命的影响——尽管进入革命队伍时不明就里，但最终是革命拯救了她。

通过反思和忏悔自己的行为彰显革命对人的改造和救赎，是这部小说的重要立意。余开贞和父亲各自走了一条不同的人生之路，但他们有一个共同

“陶纯的《浪漫沧桑》通过女主角余开贞跌宕传奇的一生，既展示了新女性对爱情的追寻和坚守，又折射出了人面对历史时的无力感；同时，小说以对革命者、反革命者和投机主义者等的形象塑造和不同力量之间激烈斗争的场面描写，以及人物对不同道路的选择，反映了历史的复杂性，也以此鉴照人性。”

点，即心中无坚定的“主义”，这也是导致他们性格和命运悲剧的关键原因。小说通过赋予人物强烈的自我意识来为行动寻找合理性。在情和义面前，余开贞常受到情感的左右，两次违纪私放被俘的申之剑即是证明。但从另一面看，她对感情和个人行动有自觉的反思意识。作为余开贞的参照系，没有坚强意志的汪默涵是一个被批判的形象。他虽然对余开贞有过纠结和歉疚，但从道德和人性上讲，这丝毫不能减轻他的罪孽，促使他最终选择了离开革命队伍，皈依佛门。

余开贞与汪默涵命运的翻转凸显了作者的历史观：善良单纯、心怀憧憬的余开贞被裹胁进入革命队伍，在爱情破灭之后勇敢地回归现实和自我，走了一条与革命道路相一致的人生之路，在斗争实践中实现了自我救赎；而满腹革命道理的汪默涵贪生怕死，沉溺于不合时宜的个人情感，最终背叛自己的信仰，被革命所抛弃，走向毁灭。汪默涵的纠结和忏悔与革命无关，只有江山以革命的名义对余开贞表达的才是真诚的歉意。

革命与个体的关系被以曲折、繁芜但又符合历史规律的方式建立起来。在反思和忏悔之外，作者的立场还体现在对革命敌人的清算上，叛徒或顽固的敌人在革命成功时都没有逃脱覆亡的命运，受到了历史的审判和惩罚；而地下党员苏小淘的冤案得以昭雪，历史终归站在了正义的一方。

■创作谈

201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作为一名军队的专业作家，我想在这个节日来临之际，出版一部革命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以此来纪念这个光辉的日子，于是从2016年春天起，我就开始动手写。

我这一生以文学创作为业，与30多年前在山东乡下求学时，读了一批红色经典有极大的关系，比如《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红日》《苦菜花》《红旗谱》《敌后武工队》等等，中国当代作家中有不少也是受它们的影响，走上创作道路的，因之，很多人都怀有英雄情结。然而在进入新时期之后，革命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却江河日下，与其他题材的创作相比，它所孕育的重要作家和作品不断衰减。个人认为，这是整个中国文学的一件憾事。

实际上，上下五千年，中华民族的历史基本就是一部战争史，尤其是改朝换代的阶段，国家都是在战乱中浴火重生。文学是现实世界的艺术映照，所以历朝历代关于战争的作品层出不穷。到了近现代中国，大规模的战争，更是谱写了中国战争史上宏大而惨烈的诗篇。与此相对应的各类军事文学作品，亦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前十七年文学创作的主流形态。

为什么这类题材的优秀长篇小说在当下并不多？或者说当代作家为什么总想回避这个题材？我认为，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这类题材的创作难度大，若要正面强攻，前面有不少篇幅，就仿佛一个个山峰，挡住了去路；二是应该承认，当下仍有一些禁区束缚着作家和出版界的手脚，正统的党史、军史难以突破，写作时放不开手脚，影响发挥；三是当代读者，尤其是一些年轻读者对半个多世纪前的革命战争缺乏热情，或者换句话说，这类题材对年轻读者没有吸引力。因此，愿意写革命战争的作家越来越少，造成了这类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沉寂与落伍。

人们都知道，爱情和死亡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而我们的前辈所经历的如此庞杂丰沛的战乱岁月，多层面、多角度地涵盖了这一永恒主题，按说是很值得作家们去开掘的。社会发展到今天，当代作家再回头去深入历史，用新的创作手法拿出适合当代人阅读的长篇小说，写出它的当代性、丰富感，进而映照现实，我认为，是时候了。个人感觉，军事文学如果用心经营，也许更容易出现黄钟大吕般的作品。

虽然动笔前有些担忧和畏惧，但我总感到，这个领域的长篇小说创作不应被忘却，尽管很难，但是如果你超过了，不就有了新高度吗？它值得你去迎难而上，攻隘闯关，值得冒一回险，因此，我不断地给自己鼓劲：你要争取写出真正配得上那个英雄时代的精品力作！要说起来，这部作品的构思其实早在10年前就开始了，它影影绰绰的在我脑子里，不时地闪现几个细节。2016年动笔之前，我仅仅粗略想好了开头部分，三个主要人物出场：余立贞（参加革命后改名为李兰贞）、汪默涵和申之剑，其他人物都是模糊的。另外我还打算故事从1936年开始，到解放初结束，主人公经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至于现在书中所呈现的故事走向、人物交集、事件冲突，以及大量的细节，动笔之前是不曾考虑好的。随着写作的进行，一些主、次要人物和场景渐渐清晰起来，与我的写作同步成长，最后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浪漫沧桑》主要通过女主人公李兰贞与汪默涵、申之剑、罗金堂、龚黑柱这4个男人的关系展开，这是错综复杂的一条主线，另一条线是把她一家在战乱年代的兴衰沉浮、巨大变迁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正面写战争，往往吃力不讨好，所以在本书中，我有意虚写战争，实写爱情，力求通过李兰贞复杂的情爱与命运，展示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写出她的希望、忧伤、追求、痛楚和悲愤。

谁都知道，写小说主要是塑造人物，越是写出新鲜的、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越是成功的标志。我想让每一个人物都有不同的性格，每一个人物争取都新奇夺目，不是苦情，不要矫情，而是真性情。在李兰贞这个人物身上，可以说倾注了我全部的心血。小说一开始，她为了追求浪漫的爱情，放弃了去美国，从而一头扎进革命阵营，阴差阳错走上一条充满荆棘的人生道路。十几年的革命生涯，她得到的是无尽的沧桑。可以说这是她为革命做出的牺牲和奉献，也可以说这是大时代的必然结果。她美丽柔弱、缺乏心计，她一生追求爱，却没有得到真正的爱情，最后只得嫁给一个级别很低的残废军人。如此看来，她似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生的失败者。但是，她又是真善美的化身，是爱的化身。看似她没有信仰，实则她的爱，她对国家与人民、土地的爱，就是她的信仰，最终她对身边的所有人都实现了超越。她就像一面镜子，今天的每个人，都应该从对照自己的影子。

黑格尔说：“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就是我们根本没有从历史中领受到教训。”我们不能忘了来时的路，我们更不能不清楚我们要去往何方。浪漫、沧桑这两个词，我感觉既能够代表战争年代人们的生命状态，也是人生的一种普遍状态。我们总是幻想浪漫，我们又总是遍体鳞伤；沧桑岁月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感慨和忧伤。文学本质上是一曲挽歌，是对过往岁月感时伤怀的记忆。

■评 论

祖国边疆的文学之歌

——敦化作家群散记 □孟繁华

敦化，被誉为“千年古都百年县”，是唐朝渤海国都城，大祚荣是渤海国第一世王。敦化是当代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区等等，抗日将领陈翰章将军就出生在这里。一个城市有这样的历史和当代荣誉，足以让我为家乡感到由衷的自豪。

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传统，在敦化的当代仍然发挥着它的影响，哺育着敦化山高水长的人文情怀。新时期以来，逐渐形成的敦化作家群一直持续至今。作家张笑天曾在敦化工作多年，他的许多作品就是在这里完成的，六顶山上建有“张笑天文展馆”。张笑天学生辈的作家中多为诗人，李广义、贾志坚、张伟、张洪波等，都是有全国影响的诗人，尤其他们书写大森林的诗作，在国内几乎独树一帜。在这些诗人之后，陆续成长起来的杨树、高春阳、朱长慧、倪薇、王玉欣等，在小说、诗歌、散文等领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杨树曾出版过多部诗集，但在我看来，杨树成就最大的还是小说《决战东宁》和散文集《渤海纪行》。《决战东宁》是一部与二战东方战场有关的小小说。小说讲述了中国抗日战争中最小、最长和最后被摧毁的“东方马奇诺防线”的故事，塑造了抗联、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国民党军人等不同的人物形象。艰苦卓绝的岁月、惊心动魄的战斗以及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使《决战东宁》成为一部既好看又有重要文献价值的作品，也是一部在题材意义上填补空白的作品。

《渤海纪行》是一部用散文的方式讲述渤海国历史文明的作品。敦化是

渤海国最早的都城，是大祚荣在敦化建立的靺鞨政权，后被唐玄宗招抚。渤海国历经229年，与唐朝共兴共灭。但它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明。杨树在这部作品中写到了敖东、钩沉了温庭筠《送渤海王子归国》，写到薛礼征东以及40岁香消玉殒的贞惠公主、渤海国建国之初来宣谕大唐皇帝诏书的使臣崔忻等。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但那些历史遗迹和曾经的人物并没有成为过去。杨树的文献阅读和实地考察，使这部带有历史文化散文性质的著作，其文学性可圈可点。

青年作家高春阳出版过诗集《五月的芳菲》、散文集《转身已是天涯》。两本书都非常有诗意，可见他对文学性的理解和青春浪漫的情怀。我非常喜欢他的散文。我们知道，时至今日散文几乎是最难写的文体。谁都可以写，但要写出新意难上加难。高春阳的散文或写自己的经历，或写人生感悟，遣词用语都十分讲究，有诗意，有韵味。

朱长慧是当代敦化作家群中较为年长的作家。他写散文，也写小说。小说集《回望江沿屯》是一部“知青文学”。这与他的知青经历有关。不同的是，朱长慧的知青小说不对知青下乡这一事件做价值判断，他只是书写“知青生活”。在“如实招来”的书写中，我们看到了不同的知青生活。因此，每个知青对这一段生活的理解是非常不同的。事实的确如此，我们在“后知青小说”中看到的场景和情感，与上世纪80年代的知青小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朱长慧的小说中，我们也发现，生活要远远大于观念。观念不断变化，生活之树常青。

倪薇是“70后”作家。她是一位

医生，工作之余竟做起小说来。倪薇的小说有时代感，有当下性。她的《床伴》《寂寞如烟》《梦醒时分》《想要的幸福》《每个孩子都是天使》等，或写情感纠纷、或写行业人物故事、或写失独家庭，都进退自如游刃有余。她的讲述方式有鲜明的女性情感特征，情节的文学性和细节的真实性，使她的小说既有可读性也有一定的思想深度。

王玉欣是专事散文的作家，曾有散文集《雁鸣湖之恋》《六号屯记事》出版。王玉欣的散文，大多生长在乡土。无论雁鸣湖还是六号屯，都与乡土有关。乡土生活是王玉欣的情感和文化记忆。在她的散文中，我们可以读到渐行渐远的乡土文化的遗风流韵。那淳朴、敦厚的乡风乡情，前现代的风情习俗虽然在淡化飘散，但那是“海东文化”之根，是古敦东乡下最后的文化遗产。

高万鹏（醉了翁）的长篇小说《万舸盈樽》，写明清两朝为官的郑芝龙。这是明末清初东南沿海台湾及日本等地的第一大海盗，也是世界史上的第一船王。小说写了他以海为生，开拓台湾抗击倭寇的复杂生涯。其间的罪恶与侠义、无畏与盲从，风生水起一波三折，填补了历史小说的空白。在这部作品中，其才华与想象力展露了可以期待的未来。

读家乡朋友的这些文字，熟悉又亲切。更令我感慨的是，在人们越来越稀少的文学道路上他们前赴后继、矢志不移，在祖国的边疆、文学的边缘处歌唱不止。故乡的这些文学朋友，除了向们表示敬意，我还能说什么呢？祝家乡敦化的文脉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第一感受

鬼事、人情和历史

——读王啸峰《隐秘花园》 □方 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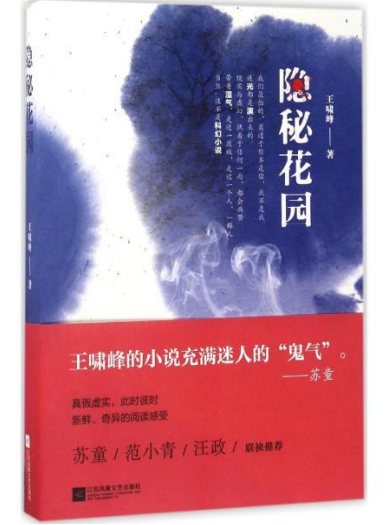
“梅雨季到来的时候……”这是王啸峰小说集《隐秘花园》的首篇《井底之蓝》中的第一句。王啸峰偏爱这样的故事氛围，潮湿、黏稠，充满阴郁的气息。大概在这样的氛围里，那些阴森、离奇的事情也就不会显得突兀了，如：“张家屋檐塌下一个角，李家井水漫过井栏，王家马桶两根铁箍同时断裂，马家花狸猫一胎四只全是死胎。”而王啸峰感兴趣的正是“一切稀奇现象”背后的神秘力量。

在《井底之蓝》中穿插着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与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的下落有关，只不过与史书记载不同的是，故事里张士诚并非自缢身亡，而是被神秘人物救走。第二个故事发生在“文革”武斗期间，一个工宣队队员在凌晨离奇消失。第三个故事则是关于突然失踪的邻居“老万”的种种传闻。野史、往事、街头传闻被“我”以解密的态度和盘托出，相互交织，彼此似互证、似排斥，真相却愈发扑朔迷离。以讲故事的方式却营造反故事的叙事效果，于是整部小说像是“烟雾散不开”。事实上，当我们意识到三个不同时代的故事的生成都与同一口井相关时，便会发现“真相”也许意味着“真相”以外的东西。

想象一下“古典”、“革命”、“当下”三个时代在同一个空间叠加的时刻，让人惊讶的并不是历史的多重面孔，而是多重面孔的重叠让真相和秘密愈发不可得。或许，只有当故事讲到结尾，语言到了尽头的时候，我们才能恍然大悟，真相便是历史本身，而历史本身无法讲述自身的秘密，如同语言无法穷尽语言，故事永远说不清故事。这

是一个玄妙、缠绕而无解的谜题和答案，或者说“真相”。或者说，真相便是真相的不可得。或许我们可以安慰自己，我们看不清吊诡的过往，分不清离奇的下当，皆因为我们身处“历史”之中。然而，当我们重新凝视那口井的时候，便会发现王啸峰似乎想走得更远，重新回味故事时，不难发现每个故事都讲述了一个困境，而每个困境都通过“井”得到了解决。在这里，“井”居然反转了通常的隐喻意义，而指向了“出路”和“未来”。既然无法洞悉真相，那么摆脱困境的惟一出路便是，逃逸出去，逃离历史。

当我指出《井底之蓝》中的“轻飘”、“虚幻”或“虚妄”、“自欺”时，我想我谈论的是观念，而非道德、伦理，且抽象意义上的“虚无”也可能是对现实情境兴致盎然地探究之后的结果。中篇小说《隐秘花园》大约就是这样的小说。故事的开头，青春期的少年发现了一墙之隔的隐秘天地，后来得知那是被变卖的祖宅的后花园。隐秘的后花园像一个天然的隐喻，既欲言又止，又牵引着叙事：“隔墙挡住了我们俩刚刚发育的赤裸身子，只露出我们的头。我第一次从冷静地看着隔墙后的一切。”时代风云变幻，家族衰落的历史伴随着少年的情欲生长而逐渐呈现出



来。隐秘的后花园既隐藏着过去的秘密和现实的根源，又何尝不是待探寻的曲径通幽、机关重重的人的欲望迷宫？这个“成长故事”叙述得感性而神秘、绵密而抽象。这里是典型的王啸峰式的写法。在他的观念里，世界由秘密构成，而人的成长便是对一个秘密的追寻和发现，而世界没有尽头，秘密也就永无止境。

王啸峰并非是一个故弄玄虚的讲故事的人。世间万象缠绕盘桓、扑朔迷离，他将计就计，用虚实驳杂的故事来试探这个世界的真相和秘密。比如《抄表记》，与其说这是一个中篇小说，倒不如说是诸多小故事连缀而成的笔记体小说。叙述者是一个抄电表的工人，从容地穿行于大街小巷，记录下那些稀奇古怪的见闻。其实，不管是那些荒诞离奇的经历，还是那些阴气森森的鬼故事，背后潜伏的都是俗世中的人情和伦理。是谓，所有鬼事皆为人情和历史。王啸峰的叙事像是多棱镜，它刻意扭曲了我们熟悉的日常经验的表象。但是，谁又能保证那折射出的光线和变形的景象不是真实世界的光和影呢？